

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

刘基文选

钱仲联 / 主编

裴世俊等 / 选注评点

明代开国文臣

道德文章第一



苏州大学出版社

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

钱仲联／主编

刘基文选

裴世俊 张青 邢光／选注评点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基文选/(明)刘基著;裴世俊,张青,邢光选注.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9
(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钱仲联主编)
ISBN 7-81037-794-9

I. 刘… II. ①刘…②裴…③张…④邢…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I2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8591 号

策划编辑 王英志

责任编辑 朱坤泉

明 清 八 大 家 文 选 丛 书

刘 基 文 选

钱仲联/主编 裴世俊等/选注评点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 215021)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通州印刷总厂 (通州市交通路 55 号 邮编 226300)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34 千字
印 张	10 插页 2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1037-794-9/I · 27
定 价	17.00 元

编辑缘起与体例

王 英 志

中国明清之前的散文自明代古文家茅坤编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八家散文为《唐宋八大家文钞》之后，乃有“唐宋八大家”之称，影响十分深远。而有关唐宋八大家的文选从古至今已出版了不计其数。但遗憾的是唐宋以后明清的散文大家及其散文作品，却一直受到冷落，从总体上挑选、评价明清散文大家的工作，极少有人问津，建国后则更未见；而读者对明清散文从总体上把握、了解的需求却是客观存在的。为此，今仿效“唐宋八大家”之名，提出“明清八大家”，以与“唐宋八大家”相呼应；并编辑“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以与《唐宋八大家文钞》相配套。此丛书计划每一位明清散文大家出一册散文选本，组成一套“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八册。此套丛书大体上反映了明清主要散文大家的创作成就，可以开阅读者眼界，使之对中国古代散文有更全面的了解；同时亦可填补图书市场空白。应该说这是一套很有意义的古代散文图书。

编选此丛书的困难在于如何确定“明清八大家”人选。如今古代文言散文研究者固已相当缺少，而能写作文言散文、能体味古体散文之三昧的专家，更难得其人。所幸年逾九旬的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尚健在。钱仲联先生不但对明清散文有精深的研究，而且自己能写作古体散文，深得其中奥妙，实为克服这一困难的最佳人选。故特邀明清诗文研究泰斗、博士生导师钱仲联教授斟酌圈定明清八大人选，力求使明清八大人选具有权威性、科学性，至

少可成一家之说，能为多数读者所接受。现经钱仲联教授反复考虑，确定明代刘基、归有光、王世贞，清代顾炎武、姚鼐、张惠言、龚自珍、曾国藩为“明清散文八大家”。此八大家的散文创作代表了明清不同时期不同文派的最高水平，亦反映了明清两代散文创作的主要成就。

丛书聘请钱仲联教授任主编，本人作为丛书的策划人及钱仲联教授的弟子，协助钱仲联教授负责具体操作，聘请、组织校内外明清诗文专家（多为从事明清诗文教学、研究的教授或文学博士）承担撰稿任务。每一散文大家入选作品篇目先由撰稿人草拟，再由钱仲联主编修订确定，使入选篇目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作家的散文成就与风格、特色。然后由策划人拟订编写内容与体例要求，确定样稿，供编写者参考，以保证丛书体例、规范的统一，提高整体质量。丛书的内容、体例大致如下：

一、每册书前皆有本“编辑缘起与体例”及钱仲联教授所撰丛书“总序”。

二、附图：每册书前附作者图像（个别阙如）、书法手迹各一幅，另附作者主要文集扉页（个别为封面或版权页）、正文书影各一幅。

三、目录：每篇文章按写作年代先后或内容类别编排，年代不详者按文集卷数先后编排。

四、前言：着重介绍作者生平、思想、散文成就与地位，使读者对该作家有整体、全面的了解。

五、正文：采用简体字，加标点符号，文章酌情分段。注释序号采用小方括号，右上标，标在句末标点符号之前。文末注明文章出处。

六、【题解】：简介本文写作时间、缘起、背景，文章的思想内容等，附带注释文章题目中的难点，在下面的【注释】中不再注释题目文字。

七、【注释】：注释内容包括人名、地名、时间、职官、器物等的

解释,典故、引文出处等的说明,以及生僻词语的拼音(另加常见同音字)、解释。本书读者一般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因此词语注释忌琐细。着重注释冷僻难懂的古文词,以及古今意义不同的词语。

八、【评点】:“评点”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侧重结合文章思想内容用简练的语言对文章进行写作艺术的分析。就一篇文章而言,着重评点一两个写作艺术特色,不求面面俱到;但就全书而言,则体现多角度、多侧面,全面充分地反映该大家文章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造诣。

九、附录:书末附录关于古文大家的传记资料、评论资料,以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古文大家的生平与事迹以及文坛地位与散文特点,并附录撰稿者所参考的原著、选本、论著等文献名称,注明版本,为读者深入探讨提供线索。

此套丛书在各方面的努力下,终于问世,期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2001年1月于苏州大学



钱 仲 联

古文，又称古文辞。古文辞之名，早见于韩愈文集，故“桐城派”姚鼐所编古文选，名为《古文辞类纂》。古文辞，是区别于六朝以来的骈偶文章而言的，而韵文中的辞赋，姚选也列为一类，以区别于唐宋时代和以后应试用的非古式的律赋。姚选本不选录律赋。

姚鼐选本，所包罗的家数极多，作家的时代，上及先秦，下迄清代桐城派的刘大櫟。属于唐宋的，则以所谓“唐宋八大家”为主体，入选的文章特别多。

“唐宋八大家”之称，最早出现的，为明后期的“唐宋派”古文家茅坤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八大家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而据《四库全书总目》所云：“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实远在坤前。”继“唐宋八大家”之后，又有所谓“金元明八大家”之目，清人李祖陶编有《金元明八大家文选》五十三卷，其书仅有原木刻本，流行不广。现在苏州大学出版社另起炉灶，计划选录明清两代古文，也以八大家为代表，取它可以继踵“唐宋八大家”，而不见逊色者，以之嘉惠士林，使后继者能以少总多，从中取得借鉴，以达到创新之目的。

那么，入选哪八大家呢？

首先考虑到的，是八家散体古文，必须是卓越杰出的，代表明清两代各种主要文派的，必须是学问高深，儒林文苑，人们一向仰为山斗的；然后，来一个结集，让读者惬意当意，可以认同。

因此，我们在明代先选了刘基。刘基政治、道德、文章，在明初

首屈一指，较之同时之宋濂，实为过之；故取以冠明代。继之为归有光，为明代“唐宋派”古文家之旗帜，姚鼐早已选入《古文辞类纂》，大家当然是首肯的。明代在文坛长期主盟的是前、后七子，他们是远宗秦汉的，唐宋不在话下。然而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实在是一位饱学之士，后期他写古文，也包含唐宋家法。他的《弇州山人四部稿》《读书后》等，佳构纷呈。归有光曾讥他为“妄庸巨子”，他笑说：“妄则有之，庸则未也。”后来他为归有光作赞，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又可以见到二人异途同归的实质。明代取此三家够了。汤显祖在词曲领域称雄，不必以古文与三家争长；其他如公安、竟陵，则成就更小。

有清一代，首取顾炎武。顾氏不但学术为一代开山，古文亦雄厚无敌，清初三大儒，黄宗羲、王夫之，俱逊炎武：黄氏文杂；王氏以《读通鉴论》著名，旨在借题发挥，为反清服务，范围较隘，故不录取。清初旧有所谓“三大古文家”者，指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侯氏虽工文，晚节不终；魏禧遗民，古文则难压倒时人；汪琬局面更小。故这里亦不选入。接着是姚鼐，代表“桐城派”，其文清窈高远，桐城派方苞、刘大櫆，都不及姚。王先谦、黎庶昌两家《续古文辞类纂》，都大量选入姚氏之文。接着是张惠言，代表“阳湖派”，惠言是学人，以“虞氏易”名家；又能为古赋，词为“常州派”宗祖，可谓一专多能。接着是龚自珍，是个不立宗派的大家，经史兼长，经则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兼长；文辞特多创新，言皆有物，影响晚清文坛，至为深远。接着为曾国藩，开创“湘乡派”，拓“桐城派”堂庑而大之，曾门四大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则包办了晚清古文事业。

以上五家，作为清文代表，可谓文坛之五岳，合之明代三家，以上继“唐宋八大家”，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了。

至于对“明清八大家”的评论、介绍，都详于各家选本的前言中，我就不再饶舌了。

2000年11月于苏州大学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像



刘基像(原刊四部丛刊本《诚意伯文集》卷首)

春興八首之一

劉基題首

柳暖花融草滿汀，日酣煙淡夢香。
枝間好鳥鳴求友，水底潛魚陟負萍。
異縣光陰空荏苒，故鄉鮪豕尚氈毼。
感時對景情何極，往往悲來總泫零。

忽聽屋角叫晨鳩，起看園林氣漸柔。
小雨霏涵日，過新泉細入河流。
殘花斷柳虛歸計，遠水他山聚客愁。
鴈南飛限蒼嶺，傷心無處問松楸。

於越山城控海壖，春風回首忽經年。
憂時望月青霄迴，懷土登樓白髮鮮。
江上波濤來渺渺，雲中鴻鵠去翩翩。
暮寒細雨餘花落，夢繞天涯到日邊。

會稽南鎮夏王封，蔽日騰雲紫翠重。
陰洞煙霞輝草木，古祠風雨出蛟龍。
玄夷此日歸何處，玉簡他年豈再逢。
安得普天休戰伐，不令竹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誠意伯文集

一

卷一至卷八

《誠意伯文集》扉頁（四部叢刊本初編集部）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二

後學麗水何鏗編校

郁離子

千里馬

郁離子之馬華得馱馱焉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內廐郁離子悅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太僕閱方貢曰馬則良矣然非冀產也寘之於外牧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喜華之山寔維帝之明都爰有紺羽之雛苞而弗朋惟天下之鳥惟鳳爲能履其形於是道鳳之道志鳳之志思以鳳之鳴鳴天下矣鳩見而謂之曰子亦知夫木主之與土偶乎上古聖人以木主



前 言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县人。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六月。其祖原是丰沛(今江苏丰县、沛县一带)人氏，南宋偏安，徙居杭州，后迁至青田。祖父刘廷槐曾是南宋太学上舍，父亲刘壻做过遂昌县教谕，这使他在书香门第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十四岁已是府学生员，习《春秋经》。后又到青田县城西北括苍山中的石门洞，师从处州名士郑复初学周敦颐、二程的理学，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至顺四年(1333)二十三岁时赴京参加会试，一举中式，步入仕途，开始坎坷曲折、跌宕起伏的生涯。惠宗至元二年(1336)，即中进士后的第三年，他被授为江西高安县丞。由于“发奸摘伏，不避强御”，慷慨直言，敢于力争，遭到忌恨和排斥，愤而辞职，回青田讲学。不到三年，又为江浙行省官起用，任行省考试官。不久因揭发监察御史失职之事，遭到上司的责难，再次辞归，寄居杭州西子湖畔，以诗酒

自娱。至正十二年(1352),台州人方国珍于海上起兵,江浙行省再荐举他为浙东元帅府都事,后又为行省都事,赴杭州与左丞帖里帖木耳商议对付方国珍之计。刘基向朝廷提出分化和剿捕的建议,非但不被采纳,反而落了个“伤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的罪名,而遭罢免,被羁管于绍兴。直到至正十六年(1356)浙江山民起义,他才恢复自由,赴处州与时任行枢密院判官、总制处州分院的石抹宜孙共谋对策。虽然政绩显著,却从分院经历改为处州总管府判,不但未提升,反而降了级,还被夺去原有的兵权。刘基愤懑和绝望之极,终于在至正十八年(1358)第三次辞官回家,归隐青田,发愤著述,写了一部传世之作《郁离子》。

此时,元末农民大起义已如火如荼,朱元璋在取得金陵并改应天府后,进军安徽,直逼浙江,连下婺州、衢州、处州等地,听到浙东名士刘基隐居青田,便派处州总制官携带重币礼聘。刘基于是结束隐居生活,及时出山,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施展抱负,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助其征东平西,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为明军北上大都,扫除蒙元,建立朱明王朝奠定了基础。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登基称帝,建章立制,任命官吏,拜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后又封为诚意伯,是开国元勋之一。刘基因整肃纲纪、举贤荐能,受到权臣忌恨,加上深知“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多次上书请求告老还乡。洪武四年(1371)恩准致仕,回归故里。三年后,因丞相胡惟庸的构陷,被下旨夺去俸禄,忍辱入京请罪。在金陵忧愤成疾,重病不起,被送回家乡,于洪武八年(1375)四月去世(一说为胡惟庸毒死),终年六十五岁。

二

刘基是元末明初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

刘基强智博学,才思敏捷,除经史诗文外,军事韬略、兵法智术、天文地理以及阴阳五行都十分精通。韬略似诸葛孔明,为人机

智,处事果断,进入朱元璋阵营后,很快成了其智囊团的核心,参与机密要事的谋议,悉心辅佐,运筹帷幄,为推翻元蒙、建立朱明王朝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朱元璋在回忆扫除群雄割据的业绩时,高度评价他的功劳说:“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抚饶郡,降洪都,取武昌,平处城之内变,尔多辅焉。”(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诏书,载《诚意伯文集》卷一)刘基也因此被传说成深谙阴阳八卦,专事风水占卜,能呼风唤雨、料事如神的奇人。其实,他“遭逢兴运,参预帷幄,秘计深谋,多所裨赞,世遂谬为前知”。从《郁离子》来看,他以儒家思想为主旨,提出一套完整的匡治天下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他后来辅佐朱元璋统一全国、建功立业的依据,可谓有远见卓识。他以治病比喻治国,得出“治乱,政也;纪纲,脉也;道德、刑政,方与法也”,认为只要握牢国家的纲纪、刑德、人才,就能治好天下,为初始定鼎的明朝提供了方略。他还奏请立军卫法,实行卫所制度,加强政治和法治建设,以均田制解决土地问题等,虽然他很快被朱元璋疏远,而使许多方略落空,但也显示了“以儒者有用之学,辅翊太平”(《明史·刘基传》)的政治家的谋略和胆识。刘基是见广识远、足智多谋的一代名臣。

刘基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所写的《天说》上、下篇,《雷说》上、下篇和《郁离子》十八章中。尤其是《郁离子》,模仿《庄子》,以寓言为主,借书中主人公郁离子之口,发表自己对政治、经济、军事、教化、世态、人情等方面的看法,大都是“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徐一夔《〈郁离子〉序》);其主要精神则是分析、批判元朝的弊政,总结经世治国经验,阐述进步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以为后世借鉴。因此,它是刘基人生经验、理想和世界观的总结与反映,在今天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刘基早年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和影响,随着元末社会政治的腐败和农民起义风暴的冲击,学术思想发生了转变,具有朴素唯物论的倾向。他认为天是物质的,包括人和物在内,都由气所形成,所谓“天以气为质,气失其平则变”(《天说》下)。他批判了神学天道

的虚妄和对它的迷信,注重人事,承认“人胜天”,“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否认天以“天灾流行,阴阳错讹”来警示人;即使人死后有鬼,也是由于愚蠢无知,信之过笃,是因主观迷惑而产生的。在认识论上,他认为人可以认识世界,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盗窃天地的权能创造世界,控制和利用自然:“人,天地之盗也。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郁离子·天地之盗》)主张从天地之间索取其“藏”,进行改造和利用,让它来为大众服务。人之所以高出其他一切动物,在于人能运用智慧、使用工具,依靠和团结大家,知道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的重要性。在“知”与“行”的关系上,重视“行”“用”,提倡尊重实际和学以致用,反对华而不实,夸夸其谈。其方法论,又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主张对事物的认识和处理要分清主次,实事求是地加以对待,辨明敌我善恶,免受其害,如《郁离子》的《救虎》篇云:“知其非人而救之,非道士之过乎?”又很重视事物矛盾的变化规律,用《老子》“祸福倚伏”的道理,说明“物极必反”,事物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发展到极端就会引起质变,转向它的对立面。他认为处理问题应防止片面性和主观性,如楚太子用梧桐之实饲养象,希望象能作凤鸣,春申君知道后对他说:“象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郁离子·养象》),讽谕主观主义的错误做法。他也讲偶然性和必然性,批评狭隘的经验主义等。这些都说明其哲学思想中的方法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科学性,值得批判地汲取和借鉴。

由于刘基目睹和亲身感受了元末专制统治的黑暗与压抑,并受到农民起义的影响,他不仅克服思想里唯心的天道观,而且在他的社会政治观里,出现了反抗黑暗统治和同情农民的进步思想。他不同意对人民苛刻地索取掠夺,反对只是一味地“取蜜”而不知养民,并站在农民的利益一边,指出众狙养活狙公,“一旦有开之”,众狙逃散,狙公即刻受困饿死,以寓言的形式,形象地说明了是农民养活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道理,揭示了阶级社会的真理和斗争的实质。他看到农民进行起义和暴动,多是由于统治的黑暗腐败和敲骨吸髓的压榨,致使生活难以为继,只得揭竿而起,逼上梁山,所谓

“石激水，山激风，法激奸，吏激民”，“小人之作乱也，由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东西南北无所容也”（《郁离子·牧羝》），道出了农民的心声。他还在感时述事诗里描绘元末官逼民反，农民“斩木为戈矛，染红作巾裳”，响应红巾军的情景，渗透着对农民参加斗争的同情。也应当看到，他的唯物论和社会政治观点，不时出现神秘性、不可知论和自相矛盾，具有那个时代和所隶属阶级的特点与局限。

三

作为文学家，刘基的文学思想独树一帜，诗文负有盛名，“其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与高启相抗；其文闳深肃括，亦宋濂、王祿之亚”（《四库全书总目·诚意伯集》）。

刘基的文学理论，和其进步思想相一致，在参与元明之际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积极的一面。他很重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不像同是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一切以宗经明道为依归，提倡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他在为王冕、昭玄上人等诗集所作的序文里，从讽诫裨世和“措大事”出发，标举诗歌的怨、刺理论，突出强调“刺”的社会功能；认定《诗》以刺为主，除了宗庙乐章的颂诗歌功颂德外，国风、二雅、变风变雅，大抵都主于讥讽，肯定“好为论刺”和“居下位而讪上”之说，为“刺”诗正名，反对“吟风月、弄花草为能事”以及“诗贵自适”，要“达穷而在下者之情”，或歌或讽都要对社会现实产生劝勉或儆戒的作用；并以“直陈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的创作方法，冲破尊奉理学，以儒家温柔敦厚为宗旨的禁锢和束缚，显得极为突出和可贵。他有感于元季纤秾缛丽之风盛行，重申“情发于中而形于言”，强调抒写遭时之乱而引起“忧恨悲愁”之情，让诗文反映“兵戈迭起，民物凋耗”的世道和以济世为己任的忧患精神，使文学的怨、刺之声和忧时感时之音更为强烈。这种文学观点所表现的进步内容，在元末明初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辉。

刘基的诗一千一百八十四首，能“独标高格”，与明初著名诗人